

年表

紀年	口述者生平	時代背景
1895		中國在中日戰爭中戰敗，清朝（1644–1911）存續。
1898		百日維新期間，中國人創辦的第一所女校《經正女塾》在上海設立；維新派主張興女學、廢纏足。
1900	陸禮華和陳詠聲出生。	義和團運動爆發。
1901	朱素萼出生。	清廷在《辛丑條約》中接受了西方列強的條款。
1903		女權主義著作《女界鐘》出版，引領了一個時代的婦女出版物和婦女活動。
1905	王伊蔚出生。	科舉制被廢除。
	陸禮華和陳詠聲開始上學。	
1907	黃定慧出生。	清廷頒佈了《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1908	朱素萼開始上學。	

1911		清朝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軍閥混戰，爭奪政權。
1912		女子參政運動興起，但不到一年就被鎮壓。
1913	黃定慧開始上學。	
1915	陳詠聲離開長沙前往上海，進入中國女子體操學校。	《新青年》創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引發了關於婦女問題的大討論。
1916	陸禮華離開青浦前往上海，進入中國女子體操學校。	
1919	陸禮華和陳詠聲參加了上海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爆發。關於婦女問題的討論進入主流媒體。很多城市實現了男女同校；婦女解放成為時代標誌。
	黃定慧在長沙的周南女校學習半年後回到了武昌。	
	朱素蓁離開常州來到上海，進入愛國女校學習。	
1920	陳詠聲從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體育師範學校畢業，成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系主任。	北京大學成為中國第一個男女合校的高校；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	王伊蔚離開哈爾濱來到上海，進入中西女塾學習。	中共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上海召開。
1922	陸禮華創辦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學校，加入婦女組織，結婚。	女權運動同盟會和女子參政協進會在全國範圍內建立。
1923	陳詠聲進入美國貝勒女子大學學習。	
1924	王伊蔚進入北京的京師高中學習。	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婦女國民會議促進運動開展。
	陸禮華參加國民會議促進運動。	
	黃定慧結婚。	

1925	陸禮華離婚，組建中國第一支女子籃球隊。	五卅慘案發生。國民革命繼續高漲。
1926	黃定慧參加國民革命，成為武漢婦女部部長和中共黨員。	北伐戰爭開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兩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蓬勃發展。
	朱素蓁進入上海法科大學。	
1927	陳詠聲從貝勒女子大學畢業。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控制了大部分中國，共產黨員成為被迫捕者。
	黃定慧擔任武漢三八節慶典的主席，並和宛希儼結婚。在國共合作失敗後，夫婦倆被派到南昌做地下工作。	
1928	朱素蓁加入國民黨。	具有版權的資料
	陳詠聲回到上海。	
	王伊蔚進入復旦大學。	
	黃定慧生下第一個兒子，三個月後宛希儼犧牲。	
1929	黃定慧被派到上海，她的兒子被送往宛家。她和賀昌結婚；企圖自殺；因罷工被關進監獄一百多天。	共產黨在上海組織大規模的工人罷工。
	陸禮華和顧正來結婚。	
	陳詠聲成為山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首任女校長。	
1930	朱素蓁畢業，結婚，創辦律師事務所。	國民政府頒佈《中華民國民法典》，規定了婦女的平等權利。
	黃定慧在香港生下第二個孩子，隨賀昌被調到天津，兒子被送人。	
	陸禮華在江灣建設學校新校區。	

1931	陸禮華帶領女子籃球隊前往日本。	日本入侵滿洲里；愛國救亡運動遍佈全國。婦女積極參與其中。
	黃定慧接到特殊任務，與賀昌分離。	
1932	王伊蔚畢業，創辦《女聲》。	一·二八事變在上海發生，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在閘北交戰。
	陳詠聲在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	
1935	王伊蔚停辦《女聲》。	
	黃定慧與陳志皋結婚。	
1936	陳詠聲在參加完奧運會後遊歷歐洲。	
1937	陸禮華的學校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被毀。	日本軍隊全面入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組成抗日統一戰線；抗日戰爭開始，婦女抗日救亡組織在全國猛增。
	陸禮華、黃定慧和朱素蓁在戰時上海婦女組織中擔任領導角色。	
	王伊蔚主編《廣東婦女》。	
1938	朱素蓁成為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和《中國婦女》的主編。	
	陸禮華在重慶開辦兩江分校。	
1942	黃定慧被關進監獄，剛生下的孩子夭折。	
1943	陳詠聲在日本佔領之際離開上海工部局女中。	
	王伊蔚在上海中西女塾教書。	
1944	黃定慧從監獄釋放。	
1945	王伊蔚重辦《女聲》。	日本投降。
	朱素蓁擔任上海婦女聯合會的常務委員和務光女中校長。	

1946	陳詠聲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開始。
	陸禮華努力收回自己在上海學校的校址。	
1947	陳詠聲取得碩士學位。	
	陸禮華在上海開辦兩江中學。	
	王伊蔚停辦《女聲》。	
1949	陳詠聲開辦中國第一所殘疾兒童學校。	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部分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婦聯成立。
	朱素萼的學校被政府接管。	
	黃定慧的黨籍被華東局領導饒漱石否認。	
1950	陸禮華的學校被政府接管。	中國加入朝鮮戰爭。
	王伊蔚當家庭教師。	
1951	陳詠聲被自己創辦的學校解僱。	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
1952	陸禮華開辦一家編織合作社。	
1954	陳詠聲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任教。	
1955	陳詠聲接受政治審查，辭職。	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
	朱素萼被關進上海監獄。	
	黃定慧被關進北京監獄。	
1957	朱素萼被保外就醫。	反右運動開始。
	陳詠聲開了一家按摩診所。	
1958	陸禮華的合作社被收歸國有，分配進羊毛衫五廠當工人。	大躍進開始；婦女被動員參加社會生產。
1962	王伊蔚進入文史館。	
1963	黃定慧從秦城釋放，緩刑三年。	

1966	黃定慧、朱素蓴、陳詠聲和陸禮華被抄家。	文化大革命開始。
	黃定慧第二次被關進秦城。	
1975	黃定慧從監獄釋放。	
1976		毛澤東去世，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評價開始。
1978		中共開始對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人員平反。
1979	朱素蓴平反。	
1980	黃定慧和陸禮華平反。	
	陸禮華進入文史館。	
1981	黃定慧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1982	陳詠聲進入文史館。	
	陸禮華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1983	朱素蓴進入文史館。	
1993	王伊蔚去世。	
1997	陸禮華和陳詠聲去世。	
2001	朱素蓴去世。	
2017	黃定慧去世。	

導論

以社會性別視角看五四時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境下，「女權主義」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貶義詞。在中國共產黨的文本中，「女權主義」一詞總是與形容詞「資產階級」以及修飾詞「西方」聯繫在一起。將女權主義從官方話語中剔除，不僅是從公眾記憶中抹去了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也順理成章地把中國共產黨描述為中國婦女的大救星。女權主義的「失敗」成為中共婦女解放路線「成功」的鮮明對照。在毛澤東時代以後，重估西方女權主義的努力成為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挑戰毛時代官方話語的嘗試。¹然而，中國婦女解放歷史的官方敘述仍然沒有受到質疑。²

在西方學術界，中國婦女解放是自1970年代初以來關於中國婦女的著述中一個持續不斷的主題。許多女權主義學者集中討論共產黨的革命與婦女解放的關係。這反映了西方女權主義者的關注點是社會主義與

女權主義之間的關係。由於難以接觸到第一手資料，1980年代的大部分著作都使用共產黨的政策和官方文件來闡釋中國婦女的近現代歷史。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這些著作中的婦女不能以社會變革的能動者身分出現。讀者無從知道，歷史中的婦女在面對其所處環境時是如何反應、應對、抗爭或者改變周圍環境的，也不清楚各類婦女在社會、政治、家庭領域的權力關係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總之，在這類以官方文件為史料的著作中，中國婦女往往成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且面目模糊不清的群體。

我的研究源於對解構主流歷史敘述的政治興趣，同時也是出於對那些關於中國婦女的敘事卻缺乏婦女主角的著述深感不滿。為了將關注點從黨轉移到婦女，來探尋婦女的能動性，我的研究問題不假設黨的領導是婦女運動的前提。我好奇的是，在「救世主」誕生之前，中國婦女都在做什麼？這個問題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國政黨勢力尚弱，婦女活動卻風起雲湧的時期——五四時期（1915–1925）。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後不久，處於政治動亂狀態的民國進入了一個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後來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和社會的發酵劑，在中國城市地區催生了一個女權主義激盪、婦女在各界積極行動的新浪潮。男性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討論「婦女問題」，並在整個五四時期都繼續著這個話題。³ 儘管中國婦女狀況一直是19世紀末以來改革者的關注焦點，辛亥革命還伴隨著第一場婦女參政運動，使「女權」一詞在20世紀初就進入中國公眾話語，但是「婦女問題」這個詞在五四時期得到了最為廣泛的傳播與普及。⁴ 關於婦女問題的公眾意識迅速崛起，與此相應的是婦女追求女權的參與度也在急劇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者宣稱這一時期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認為五四時期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他們的論述中，五四運動為創建中國共產黨鋪橋搭路，而中國共產黨則領導婦女走上一個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更高階段。中國婦女從此走上了通往光明未來的「唯一正確」道路。雖然我不同意這種帶有目的論的歷

史觀，也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是「唯一正確」的說法，但我贊同五四時期對於中國婦女來說是一個獨特而且意義重大的時期。在本書中，我將闡明在五四時期中什麼是我認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在我開始研究五四時期婦女問題後不久，就注意到了一個特別的現象。雖然五四時期對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都有強烈的吸引力，但這一時期的西方學術很少討論婦女，儘管關於「婦女問題」的史料很豐富且易於獲得。二十多年前，在一部研究扎實的博士論文中，露克珊·維特克 (Roxane Witke) 表達了她對這一現象的驚訝。她認為這些學者不討論婦女的主要原因，是這類研究會被歸入「婦女史」，因此不能超越「偏狹或自己承認的少數人的歷史的水平」。⁵到了1990年代，當社會性別已經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析範疇，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若忽略了社會性別討論，則會被認為是偏狹且不完整的。五四時期的社會性別議題不僅顯示了中國「現代性」所具有的文化和歷史特性，而且也塑造了20世紀的中國社會。通過探討社會性別議題，本書的研究嘗試重構五四時期的歷史。

一直以來，五四時期都是學者表達價值和立場的競爭場域。保守主義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要為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承擔責任。雖然文化保守主義者們的思想追求和信仰各不相同，但是對五四的批判卻反映了他們要挽救儒家傳統的共同願望，並以此回應在社會巨變中所遭遇的方向迷失。⁶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共產黨學者，把五四時期界定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必經階段。在這些學者看來，五四運動是由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所領導的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一觀點合法化了中國共產黨掌握領導一場「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權力。中國和西方的自由派歷史學家將新文化運動稱之為「中國啟蒙運動」。1980年代，中國自由派學者為了解構毛澤東時期主流話語，開始共同努力復興五四時期的啟蒙遺產。在由著名男性知識分子建構的公共記憶中，「民主」與「科學」變成了五四時期的唯一主題。1990年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快速變化中，對於許多自由派知識